

中日近代高等教育的比较

- - 以戊戌变法、明治维新为中心

唐拥华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硕士生 福建厦门 361005)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高等教育交流自古不断,隋唐时期,日本曾向中国派出大量使节及留学生来华学习,并于八世纪初仿照唐朝的国子监在日本设立了古代的大学--大学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一直是日本学习与借鉴的对象。但到了近代,中日高等教育的交流开始发生变化,中国在高等教育方面开始向日本学习与借鉴:京师大学堂章程仿自东京大学,《壬子学制》仿自日本学制,甲午战争后,中国更掀起一阵留日高潮,1906年留日学生达12000~13000之众,1909年来华任教的日本教习达405人之多。教育的发展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为什么中日高等教育的相对优势会在近代发生巨大的逆转,从而导致两国之间的高等教育的交流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是高等教育史学界一直较为关注的问题。

本文试图以中国戊戌变法时期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为中心,从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背景、指导思想及发展过程三方面对中日近代高等教育作一比较,试探讨中日两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各异的原因,以求教于方家。

一、背景

中日同为东方国家,近代以前,高等教育均以儒家经典为主体,近代高等教育都是在传统教育的基础上,学习和借鉴西方高等教育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属于所谓“后发外生型”,大体而言,两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背景有着十分相似的地方,但如果细究其详,我们会发现,两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基础其实有着起点高低的巨大差别,这种差别集中体现在教育的普及程度(或民众文化程度)和西学(西文--外国语、西艺--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西政--近代西方政治)基础两方面。

近代中国,教育的普及程度极低,民众受教育程度不高,文盲率高达90%以上,而且,传统教育中的教学内容狭窄,儒家经典占据统治地位。虽然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曾有过“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局面,但自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家经典一直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四书五经成为学子们专注的教材。隋唐开始实行的科举制加强了儒家学说在学校教育中的权威地位,并使教学内容日益狭窄,明末清初时,艾儒略等一批西方传教士也曾给中国带来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介绍了西方大学的情况,但清政府1716年颁布的禁海诏令和1757年的“闭关”却使得西学在其后再难进入中国半步,明清时期形成的八股取士更使学子沉醉于记诵圣贤书籍,而无暇他顾,这种儒家一统天下,教学内容狭窄的局面,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未改变。

与同期中国相比,日本明治时期教育改革的起点是比较高的。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就平民而论,一般认为男子有40%~50%识字,妇女有15%识字或受过正式教育”。教育的普及程度比中国高,而且西学基础也比中国好。日本受中国的影响,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曾是以儒家学说为高等教育的主要内容,但儒家学说的权威地位并没有中国这样强烈,日本在7、8世纪也实行过科举制度,但平安中期以后,科举取士就没再继续,这样,学术的繁荣发展就少了一种束缚。日本在1633至1639年间也颁布过锁国令,但却保留了长崎口岸与中国、荷兰通商,之后兰学--以荷兰语为媒介传播到日本的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源源不断地将欧洲的近代科学技术传到了日本,并逐渐进入学校教育的课堂。到近代,西学已经在日本有了一定的发展,1868年,日本全国有“藩学”240所,教学科目中设有“数学”的有141所,开设“洋学”课程的有77所,开设“医学”课程的68所,开设“天文学”课程的有5所。理科各学科在所

开设学科中所占的比例,1800年为15%,1853年增加到35%。

近代高等教育与传统高等教育相区别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近代科学技术进入课堂,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需要一定的西学基础,也需要广受教育的民众。中日两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中国在教育普及程度及西学基础上远不及同期日本,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基础很薄弱,存在先天的不足。

二、指导思想

近代的日本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近代高等教育以国立(公立)为主体,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在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数量少,影响小,政府在近代高等教育的兴办中起着绝对的领导作用,政府(领导者)对近代高等教育作用及地位的认识对该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比较两国政府在建立近代高等教育方面的指导思想对于理解两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大有裨益。

中国近代政府对近代高等教育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盲目排外的封建文化专制政策,高等教育不可能主动面向世界,学习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直到19世纪60年代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才有了开端,洋务派当时设立该馆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翻译人员,因为《天津条约》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文书写”,为了“不受欺蒙”,因此必须设馆育才,以适应与外国人打交道的需要。后来,政府眼界逐渐开阔,把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也作为办馆的目的。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对封建专制的“天朝大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中国开始对传统高等教育进行深刻的反思,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认识到了教育在人才培养、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国人逐渐认识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对一个国家的强盛至关重要,学习西方国家的高等教育不能单单学习西文、西艺,还必须学习西政,培养明体达用的政治人才。1898年,支持变法的光绪皇帝发布了《明定国是诏书》,进行维新变法,推行“废科举”,“兴学校”。维新运动虽然最终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血腥镇压而告失败,诸多教育改革措施也被废除(京师大学堂因“萌芽早”,“得以立”),但它却给长期遭受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改革旧学创办新学成为一股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1901年清政府实行所谓“新政”,改革教育,兴办新式学堂,1905年,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被最终废除,解除了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束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

相对而言,明治时期的日本政府对近代高等教育有着较为深刻、全面的认识,在成立之后不久就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着手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力图实现日本的独立、富强。1868年3月,以天皇名义发布并作为政府施政纲领的《五条誓文》中提出“破旧来之陋习”,“求知识于世界”,将教育改革与政治、经济改革看作同等重要,甚至提出“教育为本”,一举确立了日本高等教育近代化改革的基本路线和方针,这是一项富于远见的决策,其后日本近代高等教育的改革都遵循着这一路线,政府对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给予了充分的支持。

中日两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在很大程度都学习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待西学方面都有相似的指导思想:中国为“中体西用”,日本为“和魂洋才”,都主张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服务本国,但由于两国政权性质的差异,清政府发展近代高等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一些懂得外国语言,科学技术的人才,挽救、维护和巩固其封建统治,而不是为了建立完备的近代高等教育制度,这使得清末高等教育在学习西方国家时表现出强烈的急功近利特点,结果仅学皮毛,而未得精髓;日本明治政府发展近代高等教育是作为一项国策进行的,其目的是为了建立发达的近代高等教育,为其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改革服务,因此在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高等教育制度时能从总体考虑,全面学习,在整个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始终都能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

三、发展过程

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甲午战争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多是在被动或被迫的情况下予以建立的，具有急功近利的特点，虽然逐渐认识到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但在建立近代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有很多短视行为，初、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的发展不协调，造成高等教育发展的迟缓，而且教育水平和质量难以保证，后期的发展明显地从自发走向自觉，开始有整体的计划，高校数、学生数均增长迅速。

京师同文馆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开端，它的倡导者是洋务派，从1862年京师同文馆创办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30余年，洋务派创办了一些语言学堂、军事学堂，共计二十六七所。这些洋务学堂大部分属中等教育性质，但部分学堂如京师同文馆、福建船政学堂等属高等教育性质。这些学堂的开办绝大多数是应外交、军事、国防建设的需要而产生的，教学内容方面只是在传统教育内容之外增加一些急需的西文、西艺，学制方面缺乏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衔接。

甲午战争之后的维新变法时期及清末的新政时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95年天津中西学堂成立，其头等学堂以美国哈佛、耶鲁大学的学制为蓝本设计学科和修业年限，后发展成为我国第一所大学；1897年，南洋公学在上海创办，它仿照法国国政学堂创办，最初开办的目的是在于培养政治家；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是为北京大学的前身。1902年，清政府颁布“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制定的第一个学制，但并未施行，次年，清政府颁布《癸卯学制》，该学制将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三段，其中高等教育分为预科、大学堂和通儒院三级，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系统自此才算是开始全面建立。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为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扫除了障碍，同年成立的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学部为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基础。这一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迅速，1907年高校达74所，学生达12639人；1908年高校达84所，学生达16590人；1909年高校达104所，学生达18639人；1912年高校达115所，学生达41709人，这些高校后来成为建立和发展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基础。

日本近代高等教育是在明治政府土府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地建立起来的。明治政府刚成立时就有建立全国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的设想，大力改革，力图建立起适应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高等教育。1870年就先后颁布了《大学规则》和《中小学规则》，把学校系统分为小学、中学、大学三级，并使高等教育（大学教育）建立在中学教育的基础上，同时还对大学的各项事宜进行了规定，为近代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建立创造了条件。1871年明治政府建立文部省，作为中央的教育行政机构，统辖全国教育事业，为推进整个日本教育的近代化作好了组织上的准备。1872年日本颁布了《学制》，仿照法国，将全国分为八个大学区，每个学区设一所大学，每个大学区再分设三十二个中学区，每个中学区设一所中学，每个中学区再分为二百一十个小学区，每个小学区设一所小学。这样，日本就在全日本建立起了小学、中学、大学相互衔接的近代学校系统，这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77年明治政府建立了日本近代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并对东京大学给予特殊的待遇，不仅高薪聘请外籍教师来校任教，而且还选送大量学生到国外深造，每年把教育经费的40%拨给东京大学，使得东京大学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日本资本主义近代化的中心。为了加强高等教育的管理，规范高校办学，日本又先后颁布了《帝国大学令》（1886年）、《高等学校令》（1894年）、《专门学校令》（1903年），逐步建立了近代大学和专门高等学校并使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法律上的依据和保证，对日本高等教育的政党发展起到了保障作用。1910年，日本已经在东京、京都、东北、九州设有帝国大学，初步形成帝国大学群，专门学校79所，学生达到33000人，私立大学也蓬勃发展，一些私立大学如早稻田、庆应等的水平还不亚于帝国大学。

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和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需要相应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改革为前提，也需要近代初、中等教育的发展为基础。日本的近代教育改革是与政治、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近代高等教育是与近代初等、中等教育同时建立和发展的，因此日本近代高等教育从一建立起就能走上一条高速、持续发展的道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改革是在封建传统占优势的背景下单方面进行的，缺乏相应政治、经

济制度的支持,同时也缺乏必要的初、中等教育基础,因此,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举步维艰,直到甲午战争后,随着资本主义改革的逐步进行、近代初、中等教育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才开始了快速地发展。

四、结语

中日两国近代高等教育与其传统教育有着紧密的联系,两国虽然都以封建教育为传统,但日本在教育普及程度及西学基础方面比中国要好,接受西方高等教育相对容易,在建立和发展近代高等教育的起点方面比中国高;近代中日建立高等教育的是两个性质不同、强弱悬殊的政权:清政府是一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在列强入侵、国力日衰、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封建统治岌岌可危,它既不能正确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也不能正确认识近代高等教育对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同时也缺乏必要的政治领导能力和财政支持,因此,长期具有封建教育优势的中国在建立和发展近代高等教育时最终落伍了;明治政府是一个新兴的、强有力的资产阶级政权,在全面进行资本主义改革中,能正确认识近代高等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将建立近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经济改革看作同等重要,随着国力的日渐强盛,也能在全面建立近代高等教育时提供充分的经济支持,因此,虽然近代以前日本在高等教育方面曾长期模仿中国,但在近代却把握住了新的机遇,建立和发展了相对先进的近代高等教育,走在了中国的前面。

如何评价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从中日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结果的对比来看,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落后的,在发展速度、高校数、高校学生数等方面远不及日本,但我们不能仅据此就否定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意义,因为:其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有两个发展时期,甲午战争之前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但甲午战争之后的发展却是迅速的,不能绝对地说中国整个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都是缓慢的;其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是在封建传统教育势力强大、影响根深蒂固的基础上起步的,它遇到的困难与阻力远比同期日本大,仅看发展的结果,有可能忽视近代中国的具体国情,不能正确评价近代中国教育先驱者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其三、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建立虽然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虽然也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但毕竟确立了与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完全不同的高等教育制度,实现了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为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打下了一定的基础,这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注 释

陈学恂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第16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

日阿部洋:《向日本借鉴:中国最早的近代化教育体制》,《中外比较教育史》,第10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朱国仁:《西学东渐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第207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日小林哲也著,徐锡龄、黄明皖译,《日本的教育》,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3页。

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四卷)》,第38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

汤浅光朝:《科学史》,1965年,东洋经济新报社,第36-37页。

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源之害》,《饮冰室合集·文集》第1册第10页。

朱国仁:《西学东渐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第225页,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

日来部省:《学制百年史》,帝国地方行政学会,1972年,第376页。转引自顾明远主编《日本教育》,吉林教育出版社,2000年。

(责任编辑:李文英)